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

銅鏡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

16

銅鏡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

第16卷

銅鏡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出版發行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責任編輯 段書安

排版者 北京迅即印刷有限公司

製版者 蛇口以琳彩印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者 北京盛蘭兄弟印刷裝訂有限公司

裝訂者 北京盛蘭兄弟印刷裝訂有限公司

經銷者 新華書店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第一版

二〇〇五年七月第二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0-1044-7/J·410

國內版定價 三三〇圓

版權所有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主任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館長 研究員）

委員（按姓氏筆劃排列）

王世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杜迺松（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李中岳（文物出版社高級編輯）

李國樑（安徽省博物館副研究員）

吳鎮烽（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研究員）

郝本性（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館長 研究員）

段書安（文物出版社副編審）

俞偉超（中國歷史博物館教授）

陶正剛（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陳佩芬（上海博物館研究員）

郭素新（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張固生（文物出版社副總編輯 編審）

張長壽（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張增祺（雲南省博物館研究員）

顧問

楊 瑾（文物出版社編審）

楊育彬（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楊錫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趙殿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副研究員）

熊傳薪（湖南省博物館館長 研究員）

李學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 研究員）

凡例

- 一 《中國青銅器全集》共十六卷，主要按時代分地區編排，力求全面展示中國青銅器發展面貌。
- 二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選標準：以考古發掘品為主，酌收有代表性的傳世品；既要考慮器物本身的藝術價值，又要兼顧不同的器種和出土地區。
- 三 本書為《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十六卷，選錄中國青銅鏡精品。
- 四 本書主要內容分三部分：一為專論，二為圖版，三為圖版說明。

中國青銅鏡發展概述

陳佩芬

青銅鏡是古代梳妝照容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中國青銅器中自成體系、價值極高的工藝美術品，自史前銅石并用時期誕生，延綿發展到清代，距今約有四千餘年的歷史。

中國青銅鏡最早發現於齊家文化墓葬中，比中原的夏文化稍早一些。出土資料表明，這一時期的青銅鏡發現不過數十件，大都是表面比較平整、可繫繩線的薄形圓片，鏡背上飾以粗率的幾何形條紋，基本上還沒有形成一種工藝。可以說，這是青銅鏡發展的孕育期。

一九七五年甘肅廣河齊家坪墓葬出土一件青銅鏡，徑六厘米，厚〇·三厘米，鏡面有光澤，鏡背中央有一個橋形鈕，未施紋飾^①。

一九七六年青海貴南尕馬台二十五號墓出土一件七角紋鏡（圖版一），徑八·九厘米，出土時置于墓主人胸部，伴出的有海貝、骨貝、綠松石以及大批骨珠等，屬齊家文化。鏡的正面均已氧化。背面中間有鈕孔痕跡和圓形鈕座，並以此為中心施放射形七角紋，空間充填斜線，鏡的上緣有兩個對穿的小孔。經快中子活化分析，銅錫合金比例為一比〇·〇九六^②。

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一件齊家文化青銅鏡，傳為甘肅臨夏出土，徑一四·三厘米，厚〇·一五厘米，伴出有齊家文化彩陶罐。鏡背中央有橋形鈕，紋飾為兩圈三角形紋構成，紋飾的空間以斜線為地，排列較規整，鏡面微凸^③。鏡面微凸會使影像縮小，人面形象比較完整，如果這是有意的，則齊家文化鑄鏡的工匠已經初步掌握了凸面鏡成像的原理了。

齊家文化墓葬中發現的青銅鏡都比較小，製作不夠精緻，背面有簡單的陽線幾何紋。齊家文化的時代略早於公元前二十世紀之前，可能和早期的夏文化交叉。但是在夏文化遺址中沒有發現過青銅鏡的遺存。

齊家文化之後，在較長的歷史時期內沒有出現過青銅鏡，直到殷墟時期始在商代墓葬中發

現了少量的、背面有幾何紋的青銅鏡。

一九三四年河南安陽侯家莊西北崗一〇〇五號大墓出土過一件青銅鏡，徑六·七厘米，鏡背紋飾是有規則的橫直線條，邊緣有一圈彎曲狀線條^④。

一九七六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銅器，其中有青銅鏡四件。一件出于槨室，三件出于墓室，疊壓在其他器物下面。鏡背紋飾有兩種：一種是葉脈紋（圖版三），鏡背設橋形鈕，由中心向鏡緣飾放射形線條，形成二十個長條形格，內飾葉脈紋，鏡緣有比較規整的小乳釘；另一種鏡背飾同心圓紋（圖版四），內填細密的短線紋。經快中子活化分析，含銅百分之七十二·一八，錫百分之二十四·〇一^⑤。

一九八六年河南安陽大司空村南地二十五號墓也出土過一件同心圓紋鏡，出土時壓在觚的下面，紋飾較粗，但在殷墟較小墓葬中發現青銅鏡尚屬首次^⑥。

一九七四年河北青龍縣出土的同心圓紋鏡，徑六厘米，鏡背中心有橋形鈕，與婦好墓出土的同心圓紋鏡相同。此鏡邊緣不甚規整，製作粗疏。

西周時期各地的墓葬中也有青銅鏡發現，數量雖比商代稍多，但總數也沒有超過十件，質量一般都較差，背面光素或飾簡率的幾何條紋。鏡鈕的形式則稍多，有橋形、橄欖形、長方形和弓形等。鏡都較小，一般直徑在十厘米以內。

一九三三年河南浚縣辛村四十二號墓出土的西周中期素鏡，徑十厘米，背面光素無紋，僅有細長的鈕。報告中稱它「平而不凸起」^⑦。

陝西各地曾多次出土過西周時期的青銅鏡，有一九五三年岐山王家嘴窖藏出土的青銅鏡，徑八·七厘米，鏡背中心有一橋形鈕^⑧。

一九五五年禮西張家坡與客省莊一七九號墓出土的青銅鏡，徑十·五厘米，同出器物尚有獸面紋鼎、簋，報告中稱之為器蓋^⑨。

一九五八年寶雞市郊出土的青銅鏡，徑六·五厘米，與此鏡同出的尚有鼎四件、乳釘雷紋簋一件和目雷紋戈一件。從伴出的器物分析，此鏡屬於西周早期^⑩。

一九七五年鳳翔彪角鄉新莊河出土一件素鏡，徑七·二厘米，鏡鈕呈長方形。鏡體很薄，

製作粗疏。次年，同地又出土乳釘雷紋鼎和簋，證實此鏡為西周早期^⑪。

一九七九年鳳翔南指揮西村出土三件青銅器，徑分別為七·七、二和七·一厘米。兩件為素鏡，僅有一個橄欖形鈕，其中一件出土時盛放在長方形漆盒內，鏡背有一道弦紋貫穿其間，同出土的尚有青銅器和陶器，此鏡製作粗疏，屬西周早期^⑫。

一九八〇年淳化史家塬出土的青銅鏡，鏡背有橋形鈕，已殘破。同出土的青銅鼎和乳釘雷紋簋都是西周早期的^⑬。

此外，一九七五年北京昌平白浮兩座木槨墓各出土青銅鏡一件，徑分別為九·九和九·五厘米，質較厚重，鏡面微凸，背面有一個半環形鈕，無紋飾。兩墓伴出的有青銅鼎、簋、戈，形式均屬西周早期，鏡也是同時代器物^⑭。

一九八三年河北滿城要莊遺址出土一件西周時期青銅鏡，徑五·四厘米，鏡背中部偏上有一橋形鈕，無紋飾，製作粗疏^⑮。

以上各地出土的西周時期青銅鏡都是素鏡，在一些地區也出土過有簡單紋飾的青銅鏡。

一九八二年陝西淳化官莊鄉趙家莊墓葬曾出土幾何紋鏡，徑五·五厘米，鏡背中央有橋形鈕，主紋是四個圓點，圓點之間有六條短線，鏡呈不規則的圓形。與鏡同出器物有鼎、刀、斧、削，都屬西周早期。

一九七二年陝西扶風王大川村北土壕出土的重環紋鏡，徑八厘米，鏡背中央有橋形鈕，近邊緣有一周較寬的重環紋，與鏡同出的尚有鐘和車軛。鏡上的紋飾和同出器物都屬於西周中晚期^⑯。此鏡面略凹弧，可能是陽燧。

製作工藝較佳的青銅鏡，是在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發現的，其他地方發現的銅鏡，一般也是不施紋飾或僅有幾何形紋的薄片鏡。

一九五二年湖南長沙龍洞坡八二六號墓出土的素鏡，徑八·八厘米，同墓出土的尚有陶鬲和鉢，時代為春秋晚期^⑰。

一九五六年湖南長沙烈士公園六號墓出土同心圓紋鏡，徑九厘米，鏡背有一小鈕，屬春秋晚期^⑱。



鳥獸紋鏡 春秋早期

一九五七年河南三門峽上村嶺號國墓地一六五〇號墓出土兩件素鏡，徑分別為五·九和六·四厘米，出土時兩鏡複合，位于人骨架的胸部。同年又在一六一二號墓出土鳥獸紋鏡一件，徑六·七厘米，鏡背中心是弓形鈕，鈕的上方是鹿紋，下方是展翅的鳥紋，鈕的兩側是對稱的虎紋。與鏡同出的尚有鱗紋鼎和變形獸紋鼎，均屬西周末春秋初，此鏡時代相當于春秋早期^⑮。

一九六三年內蒙古寧城南山根一〇一、一〇二號石槨墓出土三件素鏡，徑分別為六·六、八·四、七·八厘米，出土時置于人骨架的腰部^⑯。

一九七二年山東臨淄郎家莊出土一件素鏡，徑九·二厘米，鏡薄，出土時還保留絲織物的痕跡，此墓可能到戰國早期，而青銅素鏡形制原始，可到春秋晚期^⑰。

一九七四年遼寧本溪明山區高台子鄉梁家村出土一件幾何紋鏡，徑十二·八厘米，背面中心有并列橋形鈕，幾何紋呈雙鉤三角形^⑱。

一九八〇年河北平山訪駕莊村北八〇〇四號墓出土帶柄素鏡一件，徑四·八厘米，柄長二·二厘米，柄端有穿孔。報告稱這是有鮮虞族特點的墓葬^⑲。

一九八六年新疆哈密五堡鄉出土一件帶柄鏡，通長一五·三厘米，同出尚有雕花骨梳、皮盒和深紅色平紋毛織物等，據碳十四測定為公元前一〇〇〇年。鏡柄末端有一橋形鈕，并繫有皮條^⑳。

一九八七年新疆和靜縣察吾乎溝四號墓地一〇五號墓出土一件卷龍紋鏡，徑九厘米，背面中心有一橋形鈕，主紋是卷龍紋，據報告稱為公元前八〇〇年^㉑。

從公元前二千年到公元前六、七世紀的青銅鏡，發現時斷時續，出土地點分布于甘肅、青海、河南、陝西、遼寧、新疆等地。從其製作工藝來看都不够成熟，這大體上反映了青銅鏡發展初期的情況。

青銅鏡在戰國時期得到長足發展，成為一種新穎的工藝品。圖案、紋飾和製作技法都有了明顯的提高。

就目前所知，長江流域的楚文化地區，尤其是湖南省，是出土戰國青銅鏡的主要地區，數

十年前流傳的所謂「黑漆古」和「綠漆古」的青銅鏡，就被稱為「長沙鏡」。本世紀前半葉，在長沙及其附近盜掘的墓葬中就出土了很多這樣的戰國鏡，大部分已流散到國外。安徽省的壽縣地區也發現了很多同類的鏡子，成為收藏者蒐集的對象。日本學者梅原末治將流散的若干資料收集起來，編印成冊，稱之為「淮式鏡」。所謂「淮式鏡」不單是戰國鏡，還包括了部分西漢鏡。楚國遷都後的新都陳和再次遷都的壽縣郢，那裏有衆多的大夫以上的墓葬，其中出土了不少青銅鏡，用銅鏡隨葬成為一種習俗。在楚文化所及地區的墓葬中，這種現象比較普遍。

戰國時期，在黃河流域的三晉地區也開始行用青銅鏡，在山西侯馬晉國鑄銅遺址中就發現了翻鑄青銅鏡的陶範五塊，鑄造陽燧的陶範三塊，陶範上有變形獸紋、交龍紋、魚紋、走獸紋和綯紋^{②⑥}，這些紋飾與當地出土青銅器上的紋飾相同。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四虎紋鏡（圖版三〇），其紋飾風格和侯馬陶範紋飾一致，無疑是晉國的青銅鏡。三十年代傳河北易縣燕下都塘湖村曾發現過三件鑄造四山紋鏡的陶範，一九五八年在燕下都城址又發現了四山紋鏡陶範，說明燕下都有四山紋鏡的鑄造是明確的^{②⑦}。但是考古發掘的三晉或北方地區墓葬中，很少有出土銅鏡的資料。發掘的秦國墓葬中，僅有一件青銅鏡的出土記錄。東方齊國臨淄故址中，曾發現背面鑲嵌金絲、綠松石和銀質乳釘、紋樣極其華麗的大型戰國鏡（圖版三二）。但這是哪個地區的產品，現在尚未可知。戰國時期交通已很發達，各種產品流通極為方便，目前習慣上大都認為，某地發現的文物，就是該地所轄國別的產品，這一推斷除非有確鑿證據，否則極難論定的。例如曾侯乙墓出土的空前精緻的青銅器群，像曾侯這樣的小國決不可能承擔龐大的鑄造任務。估計戰國時期在主要諸侯國可能存在着青銅鏡鑄造場所，這些產品通過市場可以流通到各地。傳洛陽金村古墓出土的銅鏡中，有一些呈薄片形、紋飾精細華美的青銅鏡，如現藏日本永清文庫的錯金銀狩獵紋鏡（圖版三三）和錯金銀交龍紋鏡，就是很典型的三晉鏡。總的來看，戰國時期黃河流域的諸國墓葬，隨葬青銅鏡的習俗，似乎還沒有普遍地形成。以往流行的鏡背紋飾猶如錦緞般細膩、且分布有小巧鳥獸形的薄片型圓鏡，其鏽蝕有黃土地帶生成的特點，表明這類青銅鏡可能主要是三晉地區流行的式樣。

近十年來，在文物收藏家中流傳着一些以往較少發現的套鏡，這是一種鏡面和鏡背分別鑄



菱形紋鏡 戰國

造，然後扣合爲一的特殊銅鏡。鏡背爲透雕的鳥獸紋飾，凹凸感強，使主體紋飾更爲突出。這類青銅鏡究竟流行于哪些地區，已不可知，但從所見銅鏡表面腐蝕的特徵分析，可能大都出于黃土地帶。這類銅鏡雖然在四川和湖南也有少量出土，但所見多數不是這些地區的出土物。以前見到的鸞鳥紋或鳳紋套鏡，傳有洛陽金村出土的。但真正屬於三晉地區考古發掘的則極爲稀見。這類青銅鏡的紋飾，有不分區的連續紋樣，如透雕龍紋方鏡（圖版一八），也有分成四個區的紋樣，如透雕四鳥紋方鏡（圖版一七）和透雕鳳紋方鏡（圖版一九），還有幾何形紋鏡（圖版一六），紋飾都比較規矩。鏡面與鏡背扣合的方式，大多是將透雕紋飾鑲嵌在鏡的背面，少量的也有將紋飾鑲嵌在光潔的鏡背。無論何種形式，這類鏡子都有一條較寬的邊沿，透雕方鏡的四角還有用釘鉚住的痕跡，有的透雕圓鏡還留有子口。在透雕的青銅鏡中，有的還在紋飾中鑲嵌綠松石（圖版一六），或塗有朱彩或藍彩，使青銅鏡益加華美秀麗。這種透雕的青銅鏡，在戰國以後就絕跡了。

戰國時期銅鏡的紋飾多種多樣。山字紋鏡，通常以所飾山字形的數量命名，如三山紋鏡、四山紋鏡、五山紋鏡和六山紋鏡，其中以四山紋鏡爲多，三山紋鏡、五山紋鏡和六山紋鏡都較爲少見。「山」字都是凹弧的寬條帶，其間不施任何紋飾，而且，所有「山」字都爲斜向排列。這種紋樣是從東周青銅器上的勾連雷紋移植而來。如果把勾連雷紋截取一小段，除去雷紋，則是斜形的山字紋。山字紋鏡都有地紋，地紋多爲細密的羽翅紋，和空寬的「山」字組成了疏密相宜的美麗紋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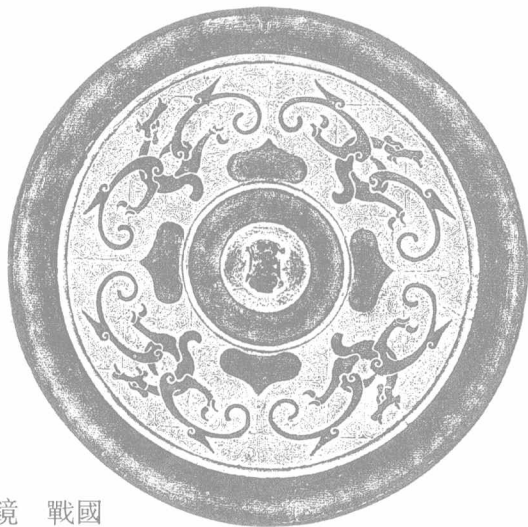
三山紋鏡傳世最少，法國巴黎有一件三山鏡（圖版二一），三山間以一犬兩鹿相間隔，徑二十厘米。另外在香港和台灣的私人皮藏中也有三山紋鏡，三山間飾以葉紋和花紋。

四山紋鏡是山字紋鏡中最的一種，有圓形和方形兩種。圓形的四山紋鏡中以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最爲特殊，它以四鹿與四山爲間隔（圖版二三）。日本有一件是兩鹿兩犬與四山相間隔，這在四山紋鏡中是極爲少見的。方形的四山紋鏡爲方形鈕座，加之與鈕座平行的底邊和四方的外形，使整個紋飾顯得有些呆板。四山紋方鏡也是少見的。

五山紋鏡均爲圓鈕座，五個山字的排列比較自由，底劃相交構成五角形。一九五八年湖南



龍紋鏡 戰國



龍紋鏡 戰國

常德德山曾出土五山紋鏡（圖版二四），但傳世和出土的五山紋鏡都比較少。

六山紋鏡，上海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各有收藏，一九八三年廣州南越王墓曾出土過一件（圖版二六），形式和紋飾與上述藏品基本相同。南越王墓葬于漢武帝時期，銅鏡疑是戰國時期遺物。

山字紋鏡在湖南長沙、常德、益陽、資興、古文等地出土較多，此外湖北鄂城、安徽舒城、河南淮陽、吉林省吉林市等地也有出土，絕大部分都是四山紋鏡。

在山字紋鏡的基礎上，湖南長沙還出土過菱形紋、曲折紋和連弧紋的青銅鏡。這是山字紋的變形圖案，行用于戰國中晚期。

菱形紋鏡，其紋飾是將凹弧形的寬條帶組成菱形紋，在菱形圖案的上下或左右兩邊疊加一角，在菱形的空間飾以四瓣花紋、鳥紋或乳釘紋。菱形紋鏡在湖南衡陽公行山二十七號墓²⁸、長沙廖家灣三十八號墓²⁹均有出土，紋飾大致相同。

曲折紋鏡，其紋飾是將凹弧形的寬條帶豎直排列成曲折狀，一般可排四條，湖南益陽赫山廟二十九號墓曾有出土³⁰。

連弧紋鏡，其紋飾用七條凹弧形寬弧線聯成一周，有的還在每一條弧線中置一圓圈。湖南長沙南門廣場九號墓和麓山裕湘紗廠一〇五號墓都出土過³¹。

羽翅紋鏡，羽翅紋原本是交龍紋的微縮式樣，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在青銅器上較為盛行。這時較完整的龍紋上出現了突出的飛翼，它和商代及西周時期青銅器上的龍紋很不相同。有飛翼的交龍紋線條很複雜，在形成精細的紋樣時不得不省略某些線條，僅留下羽翅和若干表現體軀的線條，于是發展成為羽翅紋。這種紋飾當時各國都有採用，但以長江流域出土的青銅鏡中比較多見。雖然這種紋飾排列比較均勻而密集，但從整體看變化不大，有單調感。因此有些器物就在羽翅紋中添加較小的葉紋或花紋。山字紋鏡、長尾獸紋鏡和鳥獸紋鏡常以羽翅紋作為地紋。

龍紋鏡，戰國時期龍紋鏡相當流行，通常在鏡背鐫刻三條或四條龍紋，基本上可分兩類：一類是龍紋互相交連，構圖形式是以龍頭為單組紋樣的中心，龍身、翼、尾和爪子向兩側作多

道弧圈形展開，使龍紋呈飛騰狀，仿佛有力量和速度存在。飛騰的龍翼誇張地舒曲，翼上更有小翅以填充紋樣布局的均勻，并可與相鄰龍紋互相交連。這種舒曲和交連的式樣較多，也有的回折成菱形將鄰組的龍紋作爲一個交連點，這種交連點可以是龍角的延長部分，也可作爲龍頸的交連回折，龍身、尾纏繞在此框架上。如一九五三年湖南長沙子彈庫十五號戰國墓出土的三龍紋鏤空鈕鏡（圖版九），一九五六年長沙沙湖橋二十四號戰國墓出土的四龍紋鏡，一九五二年長沙蓉園八六四號戰國墓出土的三龍紋鏡等^{③②}。最複雜的龍紋上還配有鳳紋。

另一類是龍紋不互相交連，其式樣是龍頭在中央彎曲成圈形，體軀上有兩小翼，但不展開，龍角和龍尾對稱舒張，有旋動感。也有的龍身較粗壯，頸細長，和延伸的尾部形成對稱；也有的龍身居中，兩翼向兩側曲張，如湖南長沙潘家坪六號戰國墓出土的四龍紋鏡（圖版一二）和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三龍紋鏡和四龍紋鏡^{③③}。

龍紋鏡的紋樣變化較多，而且都有細密的地紋，地紋有羽翅紋、雲雷紋和菱形框狀的雷紋并間隔點線，也有的在勾連紋中充填細密的點紋，都非常精緻。龍紋鏡鏡邊都較寬，有的飾連弧紋。

山東淄博窩托村西漢齊王墓的隨葬坑中出土了一件龍紋五鈕長方鏡（圖版五五），鏡體甚大，長爲一一五·一厘米，寬五七·七厘米。主紋是一條貫穿全鏡的龍，張口吐舌，體軀細長而彎曲。除龍紋外，近四角及中心各飾一個三弦鈕，鏡的邊緣飾內向連弧紋。

長尾獸紋鏡，通常稱爲四獸紋鏡，獸的頭似熊，有的口吐長舌，頸短而身軀粗壯，前左爪和後爪分別抵住鈕座和鏡邊，尾特長而卷曲。獸的右爪攀握前一獸的長尾，從而構成一周連續的獸紋圖案。所有長尾獸紋的體軀都不飾任何條紋，這和戰國時期偏重精細繁縟的表現形式不同，是一種新的裝飾手法。長尾獸紋都以細密的羽翅紋爲地紋，與主體紋飾形成疏密得體而鮮明的對比效果。這類銅鏡的表層大都有紅壤土層浸蝕的特徵，所以它主要是長江流域行用的青銅鏡，湖南長沙即出土很多，如一九五四年桂花園二十七號墓，一九五三年子彈庫四十一號墓，一九五三年月亮山五十五號墓，一九五二年斗笠坡七四四號墓，一九五四年魏家堆十號墓，一九五四年楓樹山四十二號墓等，都出土過這種獸紋鏡^{③④}。斗笠坡出土的獸紋鏡還保存一



2



1

鳳紋鏡（1～5） 戰國

些原有的彩繪（圖版一四）。

狩獵紋鏡，狩獵紋用以贊賞勇武精神，鼓舞士氣。在戰國時期青銅器紋飾中，已有狩獵紋出現，如山西渾源李峪村出土的狩獵紋豆，圖像表現為武士手執兵器搏擊猛獸的情景。狩獵實質上是古代軍事訓練中的一個科目，典籍及中山王方壺銘文中都有記載，但刻劃成圖像畢竟稀少。在青銅鏡上表現的狩獵紋，為單個武士與一獸相鬥的場面，但其用意是相同的。傳河南洛陽金村出土的錯金銀狩獵紋鏡（圖版三三），圖案頗為別致。

湖北雲夢睡虎地九號墓出土的狩獵紋鏡（圖版三五），圖案為兩個執劍持盾的武士，欲擊凶猛的豹，一豹前撲，一豹翻騰，其景象和一般銅鏡的圖案大不相同，可以說其表現技巧已前進了一大步，進入畫像鏡的階段了，這是青銅鏡紋樣變化中的一個重要的現象。此鏡出土于秦墓，應該看作是漢代畫像鏡的前驅了。此鏡的地紋是以細密的點和三角形組成的雷紋，這種形式的狩獵紋鏡早年也出土過，而且紋飾與此鏡完全相同^{③⑤}。

鳳紋鏡，鳳紋在戰國青銅器紋飾中很少見，在商代和西周時期的紋飾中，則常有鳳或鸞鳥與主題紋飾獸面紋相配置，而春秋晚期和戰國時期青銅器的紋飾中，基本上沒有這種配置。青銅鏡紋飾也大體如此，鳳紋很少見，但是却有一些變形的鳳紋式樣，大約可分為以下五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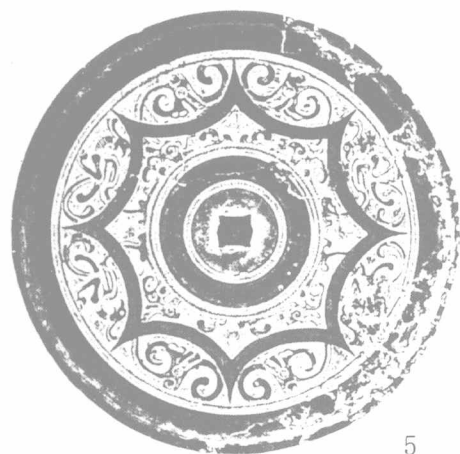
第一類，為單體鳳紋，在方鈕座的四角，各飾一長頸卷體鳳，鳳首居中後顧，鳳冠與尾勾連，尾部為一大一小S形交連，此類圖像並無任何具象的意義。

第二類，鳳長頸尖喙，有冠，體健碩，尾羽分張，一足舉起，一足佇立。鏡背以三叉戟形柱分為四區，每區各立一鳳，以羽翅紋為地紋，頗為華麗。

第三類，鳳呈S形，鳳首為S形的一端，鳳冠延長成一流暢的弧線，末端飾一花蕾。鳳後體也歧出一弧線，末端似稻穗形。S形中部另出一弧線與相鄰紋樣交連。此類鳳紋完全由和諧的弧線組成，極具圖案化，並以細密的勾連紋為地紋。

第四類，交織變形鳳紋，整體為三組圖像，作卷雲狀的複雜交織，鳳首已不具形象而爪子却鋒利可辨，體軀多施圓點紋。這種不對稱的交織構圖，是典型的戰國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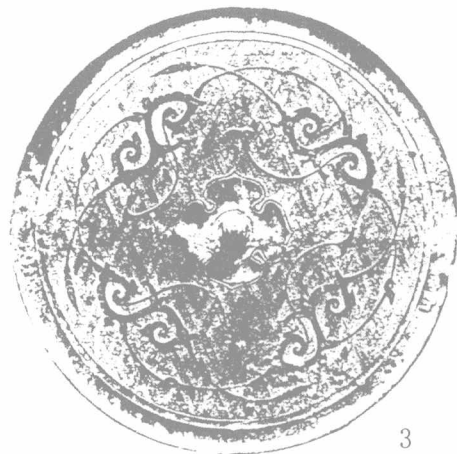
第五類，連弧鳳紋，連弧紋的出現大約在戰國晚期。連弧紋施在鏡的中區，由八條弧線連



5



4



3

接而成，在連弧紋的外緣和鏡邊之間有回顧卷尾的鳳紋，或間隔有鳳的變形紋樣。這類鏡的鑄造和行用當在西漢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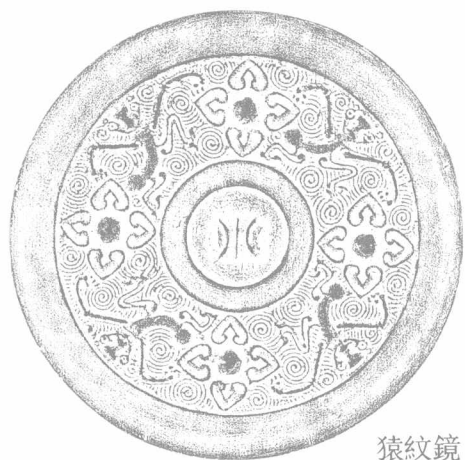
虎紋鏡，鏡邊甚寬厚，邊上有四段分界線，不同于戰國晚期的通行式樣。四虎浮雕，虎頭接鈕座，虎爪尖利誇張，此類型是春秋晚期晉國青銅器虎紋中特有的式樣，山西侯馬青銅器鑄造遺址發現的陶範中，亦有類似的紋樣。

猿紋鏡，猿作為紋飾很少見，青銅鏡上的猿紋有兩種形式，一種作側面爬行狀，猿的雙臂較長，短尾翹起，形態很靈活，四猿以四個花苞相間，以勾連紋為地紋，這是戰國晚期的。另一種猿是正面形象，額部較大，大鼻子，前臂特長，舒張而下垂，屈腿作騰跳狀，四猿與四瓣花紋相間隔，以雲紋為地紋。河北滿城寶綰墓出土的四猿蟠龍紋鏡（圖版三六），用四朵四瓣花連成一圓周，將紋飾分為內外兩區，內區飾四組卷體龍紋，外區各組中央飾一猿，兩側為卷體龍紋，以雲紋為地，時代為西漢早期。寶綰墓葬于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一〇四年。

鹿紋，青銅鏡上沒有單獨的鹿紋，但在山字紋鏡中有以鹿紋作為間隔的。有的鹿紋側面站立，豎耳、回顧，通體飾斑紋，短尾上翹。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四山紋鏡中的鹿紋（圖版二三）和法國收藏的三山紋鏡中的鹿紋，鹿均作奔跑狀，身上亦有斑紋。

獸面紋鏡，商周時期青銅器上習見的獸面紋，在青銅鏡上很少使用，河北邯鄲趙王陵周窰一號戰國中期墓出土的獸面紋鏡^{③⑥}與戰國時期青銅鐘鼓部的獸面紋相似，鏡背上下對稱飾兩組獸面紋，用突起細線勾框。獸面紋鏡在河南洛陽金村也出土過^{③⑦}。傳世還有獸面紋方鏡，紋飾布局與圓鏡相同。

秦漢之際戰爭頻仍，社會生產力遭受很大破壞，人口銳減。《漢書·食貨志》云：「漢興，接秦之敝，諸侯并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文帝時賈誼說：「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在這種社會經濟衰竭的情況下，百業疲敝，青銅鑄造業當然不能例外，而且漢初缺銅，銅料來源也有相當大的問題，因而，西漢早期青銅鏡的鑄造，不可能有新的發展。



猿紋鏡 戰國



猿紋鏡 戰國

西漢早期墓葬中隨葬的青銅鏡，基本上是戰國鏡的式樣。廣州西漢南越王墓中隨葬的六山紋鏡（圖版二六），與戰國同類鏡並無差別，很可能是戰國鑄品的沿用。政治上的改朝換代，并不等于青銅工藝也會迅速改頭換面。工藝製品的表現內容和風格的變化，往往要晚得多。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的四猿蟠龍紋鏡，其蟠龍紋是兩種不同龍紋的交疊，一種是回顧形龍紋，四爪明顯；一種為前瞻形龍紋，但四爪不明顯，後龍之頭相接于前龍之頸上，兩種不同龍形交連為圖像，基本上還是戰國風格的遺存。一號墓主人軼侯死于高后二年，即公元前一八六年，二號墓主軼侯之妻，死于其後數年或十數年，隨葬鏡子的鑄造最晚也接近于此時，不會晚于漢文帝初年。洛城戰國早期墓葬中的隨葬鏡也與戰國鏡沒有差別，而且有的還沿用到了西漢中期。

西漢青銅鏡紋飾內容的改變，大致在武帝時期，這時漢代對百姓休養生息的政策獲得成效，《漢書·食貨志》云：「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陳腐不可食。」于是出現「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的局面。武帝時的政治、經濟是西漢的高峰，在這種條件下，青銅鏡鑄造業的發展，乃事之必然。

河北滿城寶綰墓隨葬的有大樂貴富博局紋鏡、四猿蟠龍紋鏡和草葉紋鏡等。寶綰當葬于太初元年，即公元前一〇四年之前，上距劉徹建元已有三十五年，其在位共五十四年，所以這類鏡是武帝前期所製成。大樂貴富博局紋鏡的特點有三：首先是較長銘文的出現。戰國時期的銘文鏡發現很少，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三年曾在河南洛陽出土過兩件戰國銅鏡，鈕兩側都鑄有「千金」二字。西漢時期的銘文鏡在此時出現，銘文云：「大樂貴富，千秋萬歲，宜酒食」。它鏡或云：「大樂貴富得所好，千秋萬歲，延年益壽」。銘文內容反映了漢代貴族恣意享樂的思想。其次是雲氣紋的形成。此鏡滿布各種形狀的雲氣紋，雲氣紋或稱蟠螭紋，可能是龍或螭之類圖案的變形和演化。但此時這類紋樣已全然沒有任何龍類頭尾或利爪的痕跡，純為流雲形。雲氣紋在戰國晚期到西漢早期鏡中已見端倪，單獨的這樣的雲氣紋習稱為星雲紋。第三是博局紋的出現。博局紋以前稱規矩紋，外國學者稱為TLV紋樣。博局是兩人對弈的遊戲，各有六子，中有一骰，博局行子的界欄分別繪有TLV條紋。河北平山中山王墓，有一



博局紋鏡 西漢

玉製的博局盤，上雕精美的龍紋和TLV博局界欄³⁸，可見這種紋飾戰國時已出現。長沙馬王堆三號西漢墓槨室出土一套放置博局盤的盒上也有博局格道圖案³⁹。博局紋鏡，以前在新莽鏡中有發現，認為是西漢東漢之際的鏡式，由滿城漢墓的發現可知，西漢中期已經有了博局紋鏡的鑄造和「大樂貴富」銘文。

長貴富草葉紋鏡，劉勝墓出土，和寶綰墓出土的大樂貴富博局紋鏡相似，鈕座周邊是銘文：「長貴富，樂無事，日有熹，常得所喜，宜酒食」。四圍中間各飾方形乳釘花瓣，兩側為三疊形草，四角為花蕾和卷葉，鏡緣為通常的十六連弧紋。這類草葉紋鏡出現的時期和行用的年代，大體上和博局紋鏡并列。

劉勝墓和寶綰墓出土的三件青銅鏡，都是武帝時期行用的新式樣，諸如祈貴富、大樂銘文的出現，博局紋、雲氣紋、草葉紋成為主紋，鏡的邊緣用連弧紋等等，幾乎是西漢中期到新莽乃至東漢早期青銅鏡紋飾的主要特徵，這是由武帝時期出現的新格局，從此，揭示了漢鏡發展全新的歷史。

在這一時期內，博局紋鏡變化較多，當然所變的不是博局紋，而是博局中的各種紋樣，如嵌補雲氣的博局紋大致是最早的形式，然後出現龍紋博局鏡和草葉紋博局鏡，這類博局紋鏡的邊緣是連弧紋，在西漢中期或偏晚時行用，到西漢晚期博局紋鏡有了迅猛發展。公元十五年即新莽天鳳二年的博局紋鏡（圖版六〇）則大異其趣，鈕座四周為十二地支銘，在博局內有四靈紋，即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紋樣，并有羽人、蟾蜍和對鳥，尚有八個乳釘。內區有一周銘文：「始建國天鳳二年作好鏡，常樂貴富莊君上，長保二親及妻子，為吏高遷位公卿，世世封傳于無窮」。鏡邊內側飾鋸齒紋，邊緣飾纏枝紋。天鳳二年鏡紋飾流轉純熟，上距西漢末僅十幾年，必定是西漢晚期流行的式樣。事實上，發掘的西漢晚期墓葬中，這類銅鏡曾有多次出土的記錄。博局紋鏡多有銘文，除新莽的記年銘以外，還有「新有善銅出丹陽」、「新興辟雍建明堂」等，許多句中都有王莽的國號「新」。這類博局紋鏡的銘文內容，大約有四類：第一類為祈福富貴升遷的，如「大樂貴富」、「上保二親」、「遷位公卿」等；第二類為稱贊銅鏡質地的，如「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左龍右虎，朱爵玄武順陰陽」等；第三類為稱